

中国近代史学史

下册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吴泽主编
桂遵义著
袁英光

江苏古籍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近代史学史

下 册

吴 泽 主编

桂遵义

袁英光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第 二 编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
到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史学（续）

（1865—1901）

17430/21
目 录

**第二编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到义和团
运动时期的史学（续）**

（1865—1901）

第二章 封建地主阶级正统主义史学

- 第一节 王先谦史学……………（1）
第二节 叶德辉史学……………（20）
第三节 缪荃孙史学……………（30）

**第三章 封建地主阶级考据派和早期资产阶级
考据派的历史地理研究、元史研究**

- 第一节 杨守敬在历代疆域沿革地理学上的贡献……（62）
第二节 丁谦的西北历史地理研究……………（70）
第三节 洪钧的元史研究……………（78）

**第三编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五·四
运动时期的史学**

（1902—1919）

第一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

- 第一节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的三世三重说历史渐进论
……………（91）

第二节	严复后期的历史自然演进说	(102)
第三节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的确立	(114)
第四节	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132)
第五节	柳诒徵与《历代史略》	(152)
第六节	章太炎早期古文经学派的古史研究及维新思想	(165)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

第一节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189)
第二节	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章太炎的革命民主思想及古史研究	(194)
第三节	刘师培前期的革命民主思想与《中国历史教科书》	(214)
第四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在世界史、革命史研究上的斗争	(231)

第三章 封建地主阶级正统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元史研究

第一节	曾廉的元史研究	(260)
第二节	柯劭忞的元史研究	(271)
第三节	屠寄的改良主义史学思想及其对元史的研究	(280)

第四章 民初至五·四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改良派史学和封建复古史学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和清史研究	(320)
-----	--------------------------	-------

第二节	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	(341)
第三节	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上的贡献	(349)
第四节	通俗史学的发展与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 义》的编撰	(394)
第五节	封建复古史学	(415)

第五章 新史学的曙光

第一节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演变	(41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422)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427)

第二章 封建地主阶级正统主义史学

第一节 王先谦史学

一、王先谦生平及其主要史学著作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1861年入湘军长江水师响导营，和刘坤一、左宗棠相识，并在其后卷入了湘、淮派的斗争及帝党后党斗争的漩涡。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其后历任江苏学政、清国史馆总纂、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官。1890年罢官居长沙，主讲思贡、岳麓等书院。1904年放弃讲学，成为地方顽固派绅士的首脑，辛亥革命后仍从事著述。他的主要著作有《荀子集解》、《校盐铁论》、《日本源流考》、《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等。

二、编撰《日本源流考》宣扬封建君主制，反对维新变法

《日本源流考》，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二卷。记

载日本建国至明治二十六年的历史，取材于中国史书和日本史籍，用编年体编纂而成。是一部宣扬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反对维新变法的著作。

在叙述日本朝政演变历史时，以“世王”制度为主线，认为日本政治变化虽然复杂，但从开国至今始终保持了帝位的一脉相承的所谓“世王”制度和姓相传的君主血统。对此，他无限的仰慕，热情的歌颂，认为这种“世王”制度对日本臣民有所借鉴取舍，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亦可借鉴。他企图宣扬日本君主世代相传的历史，作为巩固清廷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统治的历史依据。

王先谦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长期地维持“世王”制度，主要是由于它“取则李唐”（即仿效中国唐朝统治制度），再加上后来在德川幕府专政时代，“偃武三百年，人士涵濡宋学，晓然于尊王之义”^①。在他看来，正因为日本有“世王”制度和臣民的“尊王”思想，故当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重关洞开，情势岌岌”时，国内的人们便能“藉口攘斥西人，责（德川幕府）以归政，算动群荡，纳上户土，亿兆一心，拱戴王室。”因此，“谋议翕合，上下之情通，从违之机决。”收到“曾不数年，屹然为东方强国”^②的巨大效果。

王先谦又认为，日本在明治时期，如果不是“尊王”，而是“异议纷起，或复旧制，或倡民权”，官吏与官吏之间，矛盾重重，纷争不一，必然“退归而谋乱”；被统治的人民不满于统治者，将愤而烧官府，杀官吏，掀起反抗斗争。这样，势必导致所谓“国是丛脞”，使国家蹈于危亡境地。他以此为理由，反对当时中国的康、梁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一方面向往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君主政体的日趋稳定，国势也日臻强盛；另一方面，歪曲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企图否定日本兴起是由于明治维新变法的结

①、②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序”。

果。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强盛，是由于所谓“英杰在位，审时制宜，朝廷规模，悉由初立，倾一国人，乘方新之气，日皇皇焉，惟国制之图。其前无所因，故后并不得谓之变。”^① 这里，他根本否定日本明治维新是变法。他又对日本刊行的许多维新史之类的历史书，说是“扬诤过情，观之徒乱之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②。显然，这是针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以“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而言的。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他认为：“考其内政，所施惟力课农桑，广兴工艺，为得利之实，而以官金资助商会，知保商即以裕国，从而维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这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蓄意抹煞和歪曲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某些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而将改革的范围、性质局限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力课农桑，广兴工艺”的框框内。并认为日本在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政体之后，国势虽日益强盛起来，但国内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他说：“日本以专制之国，改为立宪，已未和俄之事交关于中衢，丙午铁路之议忿争于广座，此外风潮，靡岁蔑有”。接着又说：“日本国势隆盛，尚犹如此，若制度流阔，奸宄潜滋，起而与官府相持，殆有不可问者”。^③ 意思就是说，日本那样的国家由君主专制改行君主立宪，尚且如此，况且中国较日本弱，更不能效法日本改行君主政体。故他还警告当时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说，如果遽行君主立宪，势必导致“奸宄潜滋，起而与官府相持”之局。王先谦不仅害怕康、梁所倡导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更害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坚决拥护清廷封建专制统治。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君主制度，他百般美化中国封建专制君主制度。说人民视封建君主若“天神”，“乐其宽然有余”，到处能听

①、②、③王先谦：《日本源流考》。

到“击壤之歌”，认为在中国倡导地方自治和实行君主立宪，是与中国的“国情”不符合的。他说：“夫所谓自治云者，从前西国无政教，百姓困苦，不能相忍，自上蒞下，以成此局。中国数千年圣帝明王殚其作君作师之力，积累经营，筹宪既用，防检尤密，其立国之事，不侔矣”^①。还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治之权”是由于“鸿合大朋”，互相抑制，不得不如此，而中国“自黄帝，尧、舜以来，戴君如天，望君为神，又乐而宽然有余也，而欣欣焉以自私，击壤之歌也。”结论是：“引西人自治之政，其不能相合决矣”。^②他强调中国的特殊，不能也不需要任何地方自治和实行君主立宪。

王先谦又认为，中国即使要变法图强，也不应效法日本维新的做法，搞什么君主立宪，而应当适应中国的国情，只要在地利农桑和工商业方面下些功夫就好了。他说：“开广地利，毋俾他人；我先谦审外商所以欲动吾民，而攫取财”。“行是二者，必以放勋之劳来辅翼为心。”又说：“鼓天下之民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气，国家灵长之祚或在兹乎。”^③显然，他是力图用封建统治者所能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来抵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王先谦还强调图强之计在于工艺制造，不在于改变制度，而在于人不在于“空论”。他说：

“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者，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讲求入，所务者名，所图者私，言满天下，而无以实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④

王先谦是地主阶级顽固派封建正统主义者，他的《日本源流考》一书，完全是为了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变法而写的。为达到反对维新变法的目的，他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日

①、②、③、④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序”。

本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变法的性质。为了反对地方自治、君主立宪,无耻地为清廷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唱赞歌,宣扬“君臣大义,上下名分”等封建纲常思想,并力图用封建儒学的正统思想来维护封建帝王“万世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日本源流考》不仅贯串着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封建正统主义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而且在史料上也是东拼西凑而成,在史料上亦无多大参考价值。

三、编撰《汉书补注》

《汉书》是中国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者班固是封建正统主义史学家。他站在大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点为指导思想编撰《汉书》。由于《汉书》中具有强烈的封建儒学正统思想,最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竭力推崇这部书,为稳固其封建统治政权服务。

但是,《汉书》多古字古训,一般读者不易看懂,汉末,便有应劭等为之作注解。到唐代,颜师古集隋以前二十三家的注释,汇成集注,是集大成之作,“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读讹误,解释踳驳之处,亦迭见焉。良由是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①宋明以下继有注释刊误之作,清代考据学盛行,“研究班义,考正注文,著述实富,广隆往代。”为《汉书》作注释或考辨的颇多,其中以钱大昕《汉书考异》、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汉书疏证》,以及后来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等为较突出。至于清人笔记和集文《汉书》所析疑析难的文字就更多了。王先谦补注便是吸收清代考据学的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王先谦注《汉书》,首先注意史实的诠释、疏理与通贯,使难于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序例》,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理解者通顺可读。如“律天文颜监无注，国朝钱李诸儒洞贯刘术，更推衍三统以明天文，图籍纷陈，管窥积岁，补苴罅漏，藉竟全功”。^① 难以理解的《律历志》经他补注注释之后，一般可以读通了。

王先谦对国家制度也进行了考证，阐明了很多问题。如大搜客制度的源起，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认为，周寿昌引《淮南子·天文高注》二冬时大搜客。“大搜盖起于战国，至秦益甚。观李斯、商鞅诸传及淮南子可证。汉高混一，法稍弛矣。孝文帝除关无用传，则不独宽于京师。武帝复用此法，迨巫蛊史，盖其禁悉已除矣”^②。按孝文帝十二年二月除关无用传，沈钦韩云：“终军传谓之繻，今谓之路引。”终军传言：“军从济南当诸博士，步入关，关史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返，弃繻而去。”可见西汉初年战国时期列国分立的制度仍存；各国人民出入关要用传，居住他国称客，还要大搜逐客。消除这种现象，实现统一，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完成的。

王先谦对礼制的补注特别重视。如吴仁杰对明堂的考证，是下了一番决弃工夫的。王先谦补注吴仁杰考证所提出的：“礼仪觐礼诸侯觐于天子，为官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弄，深四尺，加方明其上。方明者木也，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此盖明堂之制也。郑康成但以为会盟之仪。夫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觐诸侯者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于其上，坛也，谓巡狩至方狱之下，会诸侯为坛，加方明于其上”。^③ 吴仁杰此考甚精，解决了汉儒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杨琼虽知明堂是坛，但不知引证觐礼，没有说服力，只有吴仁杰提出了有力的依据。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律历志》。

②、③王先谦：《汉书补注·礼志》。

《汉书》流传既久，讹脱错乱是所难免。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进行了校证与纠缪。如《汉书·律历志》三统历冬至日躔在牵牛初，由此二十四节气星宿度都错了。三统历又把二十四气分配在十二次，如星纪则大雪、冬至二气，玄枵小寒、大寒二气。对此，钱大昕提出批评说：“东汉蔡邕，所分宿度较之三统率先六度，所以然者，古人未明岁差之说。三统据周末冬至日在牵牛，定斗十二度为星纪之初。东汉测冬至日躔计二十一度，遂改斗六为星纪之初。盖既以节系于十二次，节气既差而西，不得不减宿度之就矣。其实十二次者，恒星天之一周，二十四气者，黄道之一周，当而分为二，不当而为混一。……至十二次之名，多从星象取义，西陆北陆在天自有定位，而冬至日躔，岁岁不同，由于恒星天亦随黄道东移，汉人未识其故，增减宿度，以就节气，误矣。”^①黄道是太阳的视运动，在地球上看来，太阳一年运行，即从冬至绕天不足一周，冬至点七十年余要后退一度。日在牵牛初是战国冬至日躔，至太初年间应在建星，三统历所刊是错误的，十二次应该固定和二十八宿结合，不应该随节气而西移。

《汉书》是在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的时代条件下撰写的。班固是天人相应学说的信奉者。他依据刘向的《洪范·五行传》撰《五行志》，据刘歆的三统历撰《律历志》，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说渗透在整个《汉书》中。如班固说三统历推法密要，沈钦韩引历代历法专家批评的话说：“晋志：刘歆造三统以说左传，辨而非实，班固惑之，采以为志。杜预长历说：刘子骏造三正历以修春秋，日蚀有甲乙者三年十四，而三正惟得一蚀，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益故之，此不可行之甚者。案此非也，杨忠辅统天，郭守敬授时并有岁实消长之法。上考往古，则岁实百年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律历志》。

长一，周天百年消一。下验将来，则岁实百年消一，周天百年长一。姜岌云：歆历于春秋日蚀一朔，其余多在二日，因附五行传眊与侧匿之说，著春秋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迟。歆不以己历失天，反以己历害天。宋志：三统历以说春秋，属辞比事虽甚精巧，非其实也。唐志：刘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宋明天历议：刘歆三统历复强于古（谓日法），故先儒谓之最疏。明志 郑世子历议：春秋前后千载之间气朔交食，长历大衍所推近是，刘歆、班固所说非也。案班氏不知历，故以为密，亦由当时无李淳风、刘义叟者相与切究耳。”①

上述引文中的案语是王先谦写的。他以为班志所以对三统历评价错误，是因为当时无知历者相与切究，但自太初改历起汉代历法专家间论争了一百多年，班固是知道的和了解其论争的双方观点的，而且刘歆本人对历法是有研究的，三统历也确实保存了汉代历法的重大成就。太初历和他的理论化的重订本三统历所以“疏”，是因为它是用来宣传阴阳五行的学说的，是不惜牺牲数字的精确性来迁就它的学说。

三统历即使在当时是代表了历法学科的水平，但经过三千年来的历法学科的发展，以及历代历法家的批评，是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为什么王先谦要抱住它不放呢？这是因为刘歆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复古怀旧思想，正是地主阶级顽固派力求阻碍历史潮流前进所十分需要的。

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资料方面虽然比较丰富，但在注释和考证方面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天文志》营室东壁并州下，在王先谦列举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这些历代都是属于凉州地域。东井舆志雍正下，列举云中、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律历志》。

定襄、雁门、代郡、太原、上党，这些属于并州地域。上述错误是《晋书·天文志》的错误，王先谦引证时照抄了。可见，这些极明显的错误他也没有发现。另方面，他所考证的一些东西也有可疑的地方，如益州郡賁古县，说在今师宗之北，罗平州东，及贵州兴义府，牂柯郡同并县，说在滇池东境，或在今濠江府河阳县地，^①则同并在益州郡腹地，賁古县反在其东。又且兰县几乎囊括贵州省大部分地区，汉县虽大，恐不能如此宽广。同时本书中错字也不少，如《律历志》引大衍日度议：“上元甲寅岁”，“寅”误为“历”，“距义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千祀”误作“干祀”等等。

《汉书补注》前后互相矛盾。如秦三十六郡，引全祖望说：“秦初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后取扬越地，置桂林、南海、象群、辟河南地置九原郡，则此四郡不在初并天下所设三十六郡内。”^①认为应有楚郡、广阳、东海、黔中。《高祖纪》补注引全祖望的话说：“项羽所王梁楚九郡是：东海、泗水、会稽、南阳、黔中、东郡、碭郡、楚郡、薛郡。”^②而钱大昕、刘文淇、姚鼐所说九郡内有东阳、鄆郡、吴郡、颍川、郟郡、陈郡为非。王先谦又提出：“楚郡地广远，后又分为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五郡。项羽都彭城，是泗水郡也，楚亡时都寿春，如秦灭楚时置楚郡，郡治亦当在寿春，《地理志》以寿春是九江郡治，楚郡分后，已不存在。《陈涉传》王先谦案：“陈是楚郡治”。而高帝时楚国在彭城，而先谦云楚国秦楚郡改，则何以不在陈。又王先谦在高帝置郡内，涿郡下注渔阳分，如广阳为三十六秦郡之一，则涿郡当分自广阳，不当分为渔阳。《吴王濞传》王先谦案：“高帝文帝时有吴郡，景帝后合并之”。而王先谦于秦郡、高帝所置郡中也没有提到吴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秦本纪》。

②王先谦：《汉书补注·高祖纪》。

王先谦对有些研究或注释《汉书》的重要书籍，也没有收入。如杭世骏《汉书疏证》是《汉书》注疏中的重要著作，未收入。杨树达《汉书窥管》引王荣商、姚振宗、钱泰吉等说，这些人王先谦同时代或稍前时代人，他们的看法也未能收入。《汉书窥管》还证引李慈铭、周寿昌等人说，他们都是王先谦的师友辈，且参与《汉书补注》的校订工作，这些人的意见也未能收入。其遗落之多，可想而知。《汉书补注》引文也往往有误，如《郊祀志》：“周公加牺告徒新邑”，是志本文，王先谦误为沈钦韩语。又如陈景云以王子侯表：湖乡、伊乡两侯同名开，全乡就乡两侯同名不害，还有一误。而《汉书补注》以二注均入湖乡侯下，将四侯混合为一，同名两起事实抹杀无余。

周正权认为：“葵园《汉书补注》风行薄海，考史者均推为第一善本，良非偶然。顾其间摭拾甚详，而不免疵类，征引既博而微欠折衷”。陈直先生也指出，“王先谦之优点，自己创见并不多，排比校讎之役，且多假手他人。但以本书引证本书，予初学以极大便利。王先谦之缺点，是名家之精华，如钱大昕、周寿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事实确实如此，如杨树达《汉书窥管》曾说：“景帝三年七国反时，（张）释之正为淮南相，释之将淮南兵，不令王以友，事后卒不录见。《淮南传》（述此事）不载姓名，本传亦绝不叙入。”这是因为景帝为太子时坐车不下司马门，为张释之所劾，所以有关张释之的功绩不叙。这件事是颇为重要的注疏，周寿昌提出过，而没有为《汉书补注》所收录。又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一书中的内容，虽然十之六七已刊入《汉书补注》中，但仍有十分精当的内容被遗落了，如考斟寻、斟灌云：“汲冢书有之，太康居斟寻，相奔斟寻。初斟寻故国在河南，羿遣嗣侯伐之，乃弃国而保平寿，此所以斟寻有二城与。……或谓汲冢书恐未足据，是不然，其书言桀亦居斟寻。按《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则桀亦居斟寻而为商人所取。其言与汲冢

书若符契。”《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又云：冯珧利决，后夔取之，而少康伯封同出也。伯封之亡，……后羿所为天之者，亦以其党于帝相而不附己邪。羿既获伯封而用之以祭，故天问继之云：“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先谦杂引诸家之说，对有夏之居及：斟在纷争不休，无法得到结论，而吴仁杰一言决之，为现在我们研究夏史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王先谦对许多专门知识，缺乏研究，在注释《汉书》时，自然难免不少错误。如汉光禄大夫，本无印绶，可是也误引《通志》资料，说是印，反疑《汉书·百官表》中所载资料不正确，《汉书·南粤传》中的博阳侯陈搏，《汉书·高后文功臣表》有“博阳节侯周聚”语，“博阳”系“博阳”之误。王先谦承袭了这一错误把周聚说成博阳侯。王先谦不仅在注释典章制度和历史事实方面有错误，就是在注释一般句读时也同样有一些失误。

但是，我们不能因《汉书补注》在注释和考证上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就否定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由于它所搜集的资料比较丰富，对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自《汉书补注》出版后，续《汉书》的人，差不多人手一编，在当时的情况下，使《汉书》中封建儒学正宗思想和封建正统主义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得以更广泛地流传，这在当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中起了毒害人们思想的消极作用。

四、《后汉书集解》的编撰

《后汉书》，刘宋时范曄著。《宋书·范曄传》载曄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以为一家之作。他在狱中与诸侄甥书说：

“本末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